



費甲

蘇聯戲劇協會聯合會成立大會

蘇聯戲劇協會聯合會主席，葉美列默夫 (O. N. Efremov) 爲聯合會第一書記。夫率領蘇共政治局、書記處要員多名出席大會。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席拉福羅夫 (K. Yu. Lavrov) 向大會提出創辦聯合會的有關報告。大會結束時，拉福羅夫當選爲「蘇聯戲劇活動家聯合會」主席，葉美列默夫 (O. N. Efremov) 爲聯合會第一書記。

蘇聯戲劇聯合會以志願參加和權利平等爲原則，結合各加盟共和國的戲劇協會和聯合會，各地的協會仍維持其組織、創作和經濟上的自主獨立。根據拉福羅夫的報告，新的聯合會應當是各戲劇協會的繼承人，維持一切有利的功能，促進多民族劇作藝術發展。每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協會在各自地區內的戲劇事業、自己的生產企業、創作之家繼續保存並且維持財務自主。聯合會將從事全蘇戲劇措施的工作，籌辦全蘇戲劇大展，將進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劇院的聯繫，實現戲劇工作人員的夢想——每四年一次，在莫斯科舉辦世界性的戲劇大展。新協會亦將設立全蘇戲劇基金，資助演員、導演及其他會員；組成全蘇戲劇藝術宣傳局，設立出版機關並擬議發行《戲劇》雜誌。

蘇聯戲劇事業的發展多年來情況欠佳，主要原因是：(1) 缺乏專業訓練的導演和演員與優良的劇本。劇團的人數不足，全國有半數劇團人數未曾超過三八名至四二名。(2) 劇院不足，祇有六三四座劇院分佈在二七七個城市，而其他一、八六一個城市，佔全國半數人口，却沒有劇院。(3) 文化部和地方行政機關的官僚作風阻礙戲劇發展，許多劇團缺乏人力、物力，地方政府未予應有的支持；劇本受到官僚的扼殺。(4) 戲劇沒有反映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對於社會弊病未作舉發；顯然使戲劇局限於過去，而無法創新。

爲了賦予戲劇藝術新生命和改變戲劇業者困境，因而建立全蘇聯的戲劇聯合會。十二月三日，戈巴契夫特別接見劇作家、各加盟共和國戲劇組織代表，強調現在全蘇的改造亦涵蓋戲劇業，新協會應當肩負社會責任，作好和國家文化機關的相互協動作業。

在蘇共中央支持下，新成立的蘇聯戲劇聯合會擔負的任務可能包括：(1) 配合當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造，推出反映蘇共需求的新劇本、新戲目，藉以宣傳蘇共政策並抨擊社會弊病；如酗酒、政治冷感、孤獨感、浮華浪費等。(2) 在各劇團推行改革，淘汰缺乏才氣的演員，引進新血，打破鐵飯碗制度；實施財務革新，民主管理。(3) 在各加盟共和國首府設立戲劇資訊中心，使用電腦設備，協助演員在其他劇團就業；改變演員訓練制度，年輕演員應具備文化、政治學養。(4) 授予劇團更多的自主權，從劇本至演出，減少官僚干預，劇團與劇院及戲劇人士將自行負擔劇責。(5) 發展多民族戲劇

藝術，無論是古典戲劇或現代戲劇，祇要是真正的藝術，即合乎時代。(6)推動全蘇聯及世界性戲劇大展，辦理全蘇聯性質的戲劇演出和作業。

全蘇集體農莊代表會議

蘇聯集體農莊聯合會於十二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全蘇代表會議。蘇共中央書記尼柯諾夫(V.P. Nikonov)、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蘇聯國家農業工業綜合體委員會主席穆拉霍夫斯基(V. Murakhovskii)、各部會領導人、黨政代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長會議副主席、省邊區領導人員及各界有關人員參加此次會議，聯合會主席庫哈里(I.I. Kukhar)主持大會。

穆拉霍夫斯基在大會演說時表示，目前蘇聯共有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個集體農莊，有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五千名集體農莊莊員。農莊生產全國半數穀物、百分之八十八的甜菜、百分之七二的向日葵籽、三分之二的棉花、百分之三十九的牛乳、百分之二十七的肉類，農莊佔全國公共部門農業總產值的一半。不過有許多集體農莊仍未充分利用合作形式的生產潛力。在一九八六年蘇聯穀物產量為二億一千萬噸左右，比前五年的平均年產量增加三千萬噸；但是距離一九九〇年二億五千萬—二億五千五百萬噸生產目標仍然十分遙遠。穆氏最後說明一九八七年蘇聯農工綜合體的生產任務。

大會最後改選聯合會成員，莫斯科省列寧集體農莊主席庫哈里再次當選為聯合會主席。

根據報導，蘇聯當局對集體農莊的生產情形仍舊不滿，要求農莊提高生產率和穩定性，運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設備。特別是需要改善農莊的財務工作。為了鼓勵生產，蘇共提出至二〇〇〇年的農村建設目標，保證屆時每個農村家庭有自己的住宅，在所有農莊中心園區和農村有現代化的學齡前機構、中學、醫院或診所、俱樂部或文化宮、附有公共食堂和生活服務及其他項目的商業中心。目前農村公共設施仍然遠遜於城市，而農莊的經濟與生產狀況亦非十分良好。有不少集體農莊處於負債困境，為解除生產不振的積弊；蘇共正極力推行農莊的經營改革，要求農莊採取經濟核算制度、推廣集體承包制度，從而建立生產隊自負盈虧的生產責任制，使農莊避免負擔虧損。在全蘇農業體制上，繼續實施農業工業綜合體，亦即農業生產工業化，將農莊納入體系內，成為綜合體的基本生產單位。農莊的農產品可迅速通過綜合體的加工、運銷系統變成附加價值較高的商品。

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訪問莫斯科

一九八六年五月新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那吉普(Najib)於十二月十一日應邀訪問蘇聯。翌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與那吉普舉行私人會談，雙方黨政代表團在兩國總書記領導下進行談判。參與談判的蘇方人員：蘇聯

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外交部長謝瓦納澤、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切布里柯夫、國防部長索科洛夫等。阿方人員：阿富汗部長會議主席開什滿德、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副主席努爾、國防部長喇費、國家安全部長雅庫比、內政部長古梁布佐、外交部長瓦基里等。

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強調一九二一年二月廿八日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兩次簽訂的蘇阿條約係兩國友好、善鄰與合作的基礎。戈巴契夫指出，蘇聯人民與阿富汗人民團結一致，蘇聯今後準備根據現有條約和協定給予阿富汗必要的支援和協助。那吉普則說明阿富汗正努力儘早達成政治安排，將透過聯合國秘書長與巴基斯坦進行談判；希望談判結果能完全終止及保證不恢復武裝與其他形式的干涉。在宴會致詞時，戈巴契夫的歡迎詞首先表示那吉普的訪問不是尋常事件，因為此刻阿富汗正處於歷史的轉變階段。那吉普在致謝時表示，感謝蘇方對阿富汗代表團的熱烈接待；雙方在相互瞭解、友好與兄弟精神下進行了坦誠和事務性的談判。在這些會談所通過的決議，對於進一步發展阿蘇友誼，阿富汗情勢正常化將具有重大意義。

在蘇軍侵入阿富汗七週年前夕，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那吉普率領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極具特殊意義。雖然雙方談判內容未見公開，亦未發

表任何公報或宣言；但是談判顯然和一九八七年二月預定在日內瓦舉行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間接談判有關。鑒於阿富汗戰略地位的重要，莫斯科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惟蘇軍深陷泥沼七年，損失不貲，亟思撤軍，休養元氣。不過莫斯科的要求是維持阿富汗現政權的存續，美國與巴基斯坦不得再支持阿國反抗軍。自由世界是否願意讓阿富汗馬克思主義政府維存，坐視反抗軍走向絕路，特別是阿富汗仍將是蘇聯的實際附庸，仍需再三深思。

南斯拉夫共黨代表團訪問蘇聯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南共）中央委員會主席雷諾維契（M. Renović）率領黨代表團，應蘇共中央委員會邀請，於十二月九、十二日訪問蘇聯。訪問結束後，發表「南共聯盟代表團訪問蘇聯聯合公報」。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率領蘇共代表團與南共代表團舉行談判。雙方就兩黨與兩國之間關係發展前景、當前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在相互瞭解、友好與坦誠氣氛下進行談判。根據戈巴契夫的說辭，雙方檢討了經濟聯繫狀況，並據以得出結論：經濟聯繫的發展及問題的解決能保障雙方生產與科技合作進行。雷諾維契表示南共高度評價雙方之間舉行的具體、全面的意見交換。各自坦誠提出看法，再度努力使彼此的立場有更好的認知，並且能夠更實際地說明自己的趨勢和發展需要。

大體上，南斯拉夫近幾年來雖然繼續標榜狄托的不結盟政策，處於不結盟陣營中；但是在經濟活動上逐漸加強和經互會及蘇聯的合作。此係受了七〇年代下半本身經濟發展停滯及積欠西方大量債務影響所致。蘇南聯合公報指出，談判人員注意到進一步擴展和加深蘇南關係問題。根據一九五五年布爾格萊特宣言和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宣言和聲明，在務實的基礎上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及文化、其他領域的合作。雙方也決定進一步發展兩黨的合作，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當前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國際問題互相交換意見。顯然，此次南共聯盟主席的訪問，對兩黨、兩國之間關係發展較具全面性，但仍然著重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由於雙方坦誠表明各自立場，可以看出，雙方的差異仍舊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不過，這些並不妨礙兩國目前深入進行的長期經濟合作和生產專業化，並且雙方同意擴大在出版、廣播、電視、文化、教育、體育和旅遊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在現實主義基礎上，南斯拉夫體認本身經濟困境的解決不能藉助西方，因為這祇會增加外債負擔。相反地，與經互會、蘇聯的合作可避免外匯短缺、債務累積的窘境；參與生產合作和專業化至少可解決國內工業企業停滯與勞工失業增加的問題。雷諾維契代表南共中央和政府邀請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七年訪問南斯拉夫。無論戈氏是否成行，單就此次兩黨的交流，預示雙方關係日益親善，並將繼續發展。

蘇共代表團出席越共黨大會

蘇共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里加契夫（E. K. Ligachev）率領代表團參加十二月中旬在河內召開的越南共黨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此次越共黨大會出現激烈人事變化，原任總書記長征、總理范文同和巴黎和談代表黎德壽均因年老告退，經濟改革派的阮文靈當選總書記。這些標誌著越南正處於轉變時刻，全力謀求挽救惡化中的經濟頹勢。

里加契夫在越共黨大會上表示，蘇方樂於見到越共的革新路線和蘇共廿七大設定的革新精神相呼應，蘇共相信越南這種實際主義的決議將走向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里氏並且介紹蘇共在本國的經濟改革措施，包括擴大基層生產單位的財政自主權力，俾使個人、集體與社會三者利益相結合。對於蘇越關係，里氏特別指出一九八六年八月和十一月，兩國共黨總書記會談達成的協議，開啓了雙方相互協助、提高合作效率的新時期，尤其是在經濟方面。蘇共認為，發展和越南的合作是所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國際義務。里加契夫論及亞洲局勢時，聲言蘇聯不覬覦某種特權，不為自己的利益而損及他國，不因保障自己的安全而犧牲異己。關於蘇聯與中共關係，他說，蘇聯過去和現在都贊同與中共在不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原則基礎上

，發展善鄰關係。

蘇聯與越南的關係近十數年來一直受到亞洲鄰國和西方的注意，一九七九年中甚至出兵教訓越南，而蘇聯在金蘭灣的海軍活動更令亞太諸國不安。但是，八〇年代以來，蘇越關係並非如外表上的融洽合作無間，彼此互有不滿和抱怨、疑忌。蘇聯的慷慨援助是有條件的、非無償的，即使是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預定經濟援助額八十至九十億盧布（約值一百七十七至一百三十二億美金），越南每年需大量輸出作為償還。蘇聯協助河內建立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民生消費品工業，其生產品和農副產品則需送往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克里姆林宮一再強調要提高經濟合作效率，善加運用投資，無疑公開指責越南不善於經營、浪費。蘇聯與中共改善關係，雙方接觸日益頻繁親善；越南則深恐成爲蘇「中」交好下的犧牲者。因此河內不放棄爭取和華盛頓接觸或談判機會，私下希望美國能提供更慷慨的援助和賠償。自然，越共領導的更替和經濟改革的迫切需求，將使越南的對外政策有更大彈性。越南自高棉撤軍一事業已定下期限；河內可能實施門戶開放的對外經濟策略；中越共修好遠景亦具樂觀性。在蘇越之間逐漸講求實際利益、莫斯科不願單獨承擔援越重擔（要求經互會其他成員國加強和越南合作）、河內經濟面臨易轍之際，蘇共與越共的友好關係如何發展？是否會陷入五〇年代中蘇共關係逆向變化的覆轍？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日蘇圓桌會議

第五屆日蘇圓桌會議於十二月一至三日在東京舉行，日方二百八十八人，蘇方一百廿七人參加。自一九七九年召開首屆會議後，雙方輪流在東京和莫斯科舉行；會議成員名義上是來自社會各界的人士，不具官方性質，包括政界、工商企業、文化界。本屆會議主題是「日蘇社會人士在保障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角色」，著重在討論裁廢核武、日蘇政治關係、日蘇經濟合作問題。日本代表團團長爲前外相櫻內義雄，蘇聯代表團團長係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主席沃斯。日本首相中曾根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向大會致贈賀詞。雷日科夫在賀詞中表示，蘇聯對發展同日本的交流給予高度評價，認爲現時進一步擴大多方面關係存有不小的發展潛力。

圓桌會議結束後發表公報，並決定一九八八年在莫斯科舉行第六屆會議。

儘管圓桌會議祇是民間性質的組織，由於每屆參與人數衆多，又具相當社會地位，無形中成爲蘇日雙方政府意見溝通的重要管道。聯合公報說明，與會人士對於裁廢核武問題達成原則性協議，此與日本官方立場相背。雙方同意，必須動員國際輿論以終止軍備競賽和外交軍事化。對於日蘇關係的積極變革表示滿意，與會雙方贊同擴展政治接觸，發展經濟、科技領域的互惠合作，尋求新形式的貿易經濟聯繫，擴大文化、教育、體育方面的交流。

日蘇政治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仍然是北方四島歸還問題。蘇聯堅稱領土糾紛不存在，而日方堅持要求蘇聯應當歸還戰時被佔領的四個小島。這是日蘇雙方在任何場合均無法避免的爭執，也是目前難以解決的死結。至今，蘇聯仍未明白宣示放棄四島，雖然一九五六年日蘇宣言曾暗示蘇方準備歸還其中兩島。鑒於政治關係經常受到領土問題的困擾，蘇聯當局一直希望能與日本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訂立關於經濟合作原則的協定，共同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資源，發展科技合作（結合蘇聯的基礎研究成果與日本的應用技術成果）。一九八六年七月底，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對亞洲新政策，明示開放俄屬遠東，加強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顯示蘇聯亟欲改變西伯利亞落後面貌，躋身於亞太地區國際舞臺；爲達此目的則須借重外來資金和技術投入，日本乃係蘇聯爭取的理想對象。對日本財經界而言，發展經貿合作固屬有利；惟基於國家立場，仍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經濟爲誘餌謀使蘇聯在政治（領土）問題上讓步。圓桌會議雖然再次表達促進關係發展的意願，但在日本政府指導下，政經分離原則還是不適用於蘇聯。